

# 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生活运动

关志钢

对新生活运动的研究,长期以来,人们多局限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新生活运动的评价方面,对于抗战期间新生活运动的研究很少有人涉足。笔者觉得,抗战爆发前后新生活运动在活动内容、指导思想、实际作用等方面有着很大差异,值得深入探讨。下面仅就抗战时期新生活运动的有关问题谈点看法,请学者们不吝赐教。

## 一、抗战爆发前新生活运动的简单回顾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蒋介石于1934年2月,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他把这一运动称为“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一个最基本亦最有效的革命运动”。<sup>①</sup>从这时起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新生活运动在国民党党政军警机关的积极参与下,曾经风行一时,由初期发展、推广进而达到鼎盛。

这一时期,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最为起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组织机构方面,自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以后,南京、上海、江苏、河北等省市也相继成立了类似机构,短短一个多月,新生活运动便由南昌一地推广到全国。在此基础上,1934年7月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以下简称“新运”总会)在南昌宣布成立,蒋介石亲自担任会长,“负责新生活运动最高指导之责任”。<sup>②</sup>据统计,到1936年底为止,各级各类“新运”组织已遍布全国各个角落,构成了庞大的组织网络,计有省

①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1934年2月19日),《革命文献》第68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发行,第20页。

②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组织大纲》,《新生活之实施》,国民图书出版社1944年6月版,第188页。

“新运”会21个，市（指院辖市）“新运”会4个，县“新运”会1355个，铁路“新运”会14个，华侨“新运”会19个，公路“新运”会1个，各机关“新运”会109个；另有劳动服务团2471个，这是“新运”系统规模最大的组织，成员多达395262人。<sup>①</sup>

在工作推行方面，战前新生活运动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规矩与清洁运动、生活“三化”运动、劳动服务运动、夏令卫生运动等，同时还先后推出一些旨在改进国民生活习惯的具体措施，如禁烟禁赌、破除迷信、婚丧节俭等，曾经造成较大声势。在理论方面，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积极提倡恢复四维八德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鼓吹法西斯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一切进步文化。主要宣传工具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刊》及《新运月刊》和《新运导报》。蒋介石等人不仅极力美化封建文化，还将新生活运动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诸般“偏颇”的补救措施，认为“新生活运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底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sup>②</sup>

由于新生活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反动性和保守性，遭到人民群众的抵制，收效甚微。其结果正象蒋介石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新生活运动自创始以来，虽然推行的区域一天一天的加广，工作的项目和范围，一天一天的加多，推行团体和人员，也随时都有增加，……可是就一般的成效和实际情形来说，实在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达到原来的目的。不但如此，简直可以说有退无进”<sup>③</sup>；“三年来新运的结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sup>④</sup>。事实上，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以维

① 《二十五年本部工作概况》，《新运导报》第4期，1937年3月发行；参见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湾实践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40页。

② 贺衷寒，《新生活运动之意义》，《新生活月刊》第1卷创刊号，1934年6月发行。

③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之感想》（1936年2月19日），《革命文献》第68辑，第44—45页。

④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训词》（1937年2月19日），《革命文献》第68辑，第56页。

护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独裁统治为根本宗旨的新生活运动，已处于进退维谷，面临失败的困难境地。

## 二、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的转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终于放弃长期以来 的对日妥协方针。7月17日，蒋介石就卢沟桥事变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指出：“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机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他还说道：“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sup>①</sup>毛泽东曾称蒋介石的这次讲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sup>②</sup>随着国民党对日方针的改变，新生活运动的情况同战前比较也有了很大的不同，转上了以服务抗战为基本宗旨的轨道。

促使蒋介石集团调整新生活运动指导思想和服务宗旨的原则大致有这样几条：

第一、从卢沟桥中国守军打响对日抗战的第一枪起，抵抗日本侵略者，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就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这一前提下，新生活运动只有为抗战需要服务才有出路。同时，新生活运动当初曾伴随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方针而实施，随着蒋介石由对日妥协到对日抵抗的转变，新生活运动的服务方向自然也要作相应变更。

第二、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发轫时，国共两党正处于尖锐对峙

① 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册，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6年10月编印，第1—4页。

② 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横排版，第316页。

状态，新生活运动因而成为蒋介石从意识形态领域配合其军事剿共的重要手段。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实现后，尽管蒋介石不甘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强大，但再象以前那样利用新生活运动鼓励和提倡各种反共宣传，毕竟行不通了。只有宣传一致对外，共同抗战，新生活运动才能赢得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抗战之前三年多时间里，虽然国民党上上下下推行新生活运动十分卖力，可其成绩还是一年不如一年，“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它既没有使中国“固有道德”得以复兴，也没能实现“符合礼义廉耻的现代生活”，连最起码的整齐和清洁都未普遍做到，更谈不上“挽救危亡，复兴民族”。战前新生活运动的开展已近于穷途末路，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以上情况表明，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集团之所以调整 and 改变新生活运动的服务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奈，是由于他们原来设计的那一套推行不下去了。当然，这种转变客观上是有益于中国抗战事业的。

战时“新运”宗旨的转变，首先反映在蒋介石集团关于“新运”的理论指导上，强调新生活运动为抗战服务，成为这一时期“新运”宣传的基调。1938年2月新生活运动四周年纪念时，蒋介石在汉口发表广播讲话，指出战时“新运”的首要任务就是“雪耻复仇”。他说：“现在我们几千年礼义之邦，给敌寇来这样的蹂躏糟蹋，敌军的残酷禽兽行为污辱了我们庄严的国土，残害了我们多少的同胞，我们生在这一个时代的国民，每一个人都担着无穷的耻辱，到今天来谈新生活运动，还有比‘雪耻复仇’更重要的吗？”为此，他要求新生活运动的推行，必须充分发扬“鞠躬尽瘁”、“亲爱精诚”的精神，使全国同胞“一心一德，不屈不挠，奋斗到底，来求得抗战的胜利”。<sup>①</sup>

其次，从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于“礼义廉耻”的重新解释，

①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四周年纪念训词》（1938年2月19日），《革命文献》第68辑，第60—63页。

也能看出战时“新运”服务宗旨的转变。新生活运动发动伊始，蒋介石就把“礼义廉耻”树为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并对这四个字的涵义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其内容不外乎什么“守法循礼”，“克敦伦纪”，“舍己济人”，“不争权利”，“安分守己”，“审慎取予”，“力排谬说”等。<sup>①</sup>贺衷寒则将“礼义廉耻”界定为“礼以遏乱，义以止暴，廉以弥贪，耻以防滥”。<sup>②</sup>所有这些无非是劝诫人们不要犯上作乱，要安于现状，遵守反动统治秩序，心甘情愿地接受封建买办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使新生活运动“能够和抗战建国的实际需要互相配合”，蒋介石对“礼义廉耻”作了重新阐释，指出：在抗战时期，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慨慷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

“战时一切的行为，须守纪律，负责任，明公私，尚力行，而在国家民族利益之前，绝对的不惜牺牲，这就是礼义廉耻四字在战时生活上的解释。”<sup>③</sup>抗战以前，“礼义廉耻”是用来束缚人民群众使之服从国民党统治的道德规范，现在则成为包括国民党自己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都应信守的战时行动准则，这是一个进步。

再次，战时“新运”服务宗旨的转变，还反映在各项“新运”工作计划大多是围绕抗战这一主题确立方面。抗战八年中，蒋介石每年都要以“新运”总会会长的名义布置新生活运动的工作内容，例如，1940年2月19日“新运”六周年纪念时，蒋介石提出，新生活运动第七年度的主要工作应为“厉行精神动员，策进战时生活”，“协助兵役建设，尊敬受伤战士”，“协助肃清烟

① 详见《新生活运动纲要》，《革命文献》等68辑；《新生活须知》，《革命文献》第29辑；蒋介石：《礼义廉耻的精义》（1934年4月9日），《三民主义历史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年3月发行。

② 贺衷寒：《新生活运动之意义》，《新生活月刊》第1卷创刊号。

③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五周年纪念训词》（1939年2月19日），《革命文献》第68辑，第67—68页。

毒，增进国民健康”，“促进国民经济，增加战时生产”。<sup>①</sup>这些与支持抗战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同战前那些空泛的口号比较要实际得多。

正因为有了以上变化，抗战期间新生活运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进步力量的支持，“新运”总会发起的战地服务、伤兵慰问及节约献金等活动，均有共产党人参加。这也是战时“新运”得以顺利开展的原因所在。

### 三、抗战期间新生活运动的组织概况

抗日战争时期，新生活运动内部组织机构基本沿用旧制，变化不大，只是根据战时的需要，成立了许多抗战服务团体。

1937年底南京沦陷后，“新运”总会在武汉设立办事处，协助政府保卫大武汉。在武汉期间，“新运”总会在会长之下增设指导长一职，由宋美龄担任。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新运”总会西迁，设办事处于重庆，直至1946年2月返回南京。

1940年7月，章楚继阎宝航担任“新运”总会副总干事。1941年1月，总会又增设一名副总干事，由杨舞心担任（一年后杨因故离职）。为适应战时需要，1941年8月，“新运”总会调整内部机构，由谈家栋、严肃、章楚、潘小萼分别担任总务、推行、服务和卫生组组长。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召集妇女代表谈话会，根据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决定扩大原有的“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吸收各界妇女参加。中共驻武汉代表邓颖超曾一度参与该会的指导工作。<sup>②</sup>

抗战期间，由于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日军占领区的“新运”不复存在，在那些“拉锯”地区，新生活运动也难以展开。到1944年初新生活运动十周年紀念时，省“新运”会仅存有14个，

①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六周年纪念训词》，《革命文献》第68辑，第72—73页。

② 参见《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1983年第5版，第42页；《新运十年》，《革命文献》第68辑，第204页。

公路“新运”会1个，机关“新运”会109个。<sup>①</sup>在大后方的某些省区，还保留有为数不多的县“新运”会，主要集中在川、陕、云、贵一带。

为了积极支持前方抗战，在“新运”总会指导和组织下，成立了许多抗战服务团体<sup>②</sup>，现依成立时间先后择其重要者简介如下：

1. “新运”伤兵慰问组。1937年9月25日在南京宣布成立，由黄仁霖兼任慰问组组长。慰问组下设5个犒赏队，队员主要是从“新运”系统抽调，负责从事有关前线伤兵的慰问犒赏工作。后因战事需要，伤兵慰问组充实机构，先后成立总务、犒赏、慰劳、视察4个科，犒赏队增至11个，并在川、鄂、滇、黔、粤、桂、陕等省区设立了办事处。

2. “新运”医务委员会。前身是武汉会战时“新运”总会与妇女慰劳总会和战地服务团共同组织的救伤队。武汉失守后，“新运”总会在重庆发起成立“新运”医务委员会，得到各界积极响应。从1939年1月起，医务委员会在原救伤队基础上改建扩充8个医疗队，分别派往大后方各省，为抗战做了较多工作。宋美龄参与了该委员会的组织与指导工作。

3. 军委会战地服务团。1939年8月8日，原“新运”战地服务团依照蒋介石的指令实行改组，改隶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本人任团长，黄仁霖兼主任，团员多由各级“新运”促进会调派。服务团由总务、慰劳、视察、巡回服务和军人服务5个组组成，在全国各大战区设有服务总队及服务所、处数十个。

4. 伤兵之友社。这是抗战期间“新运”系统规模最大的抗战服务团体，1940年2月在重庆成立总社，主要负责为受伤官兵征友活动。同年4月，伤兵之友总社理事会组成，孔祥熙任理事长，黄仁霖为总干事，下设总务、推行、训练3个组及全国服务

① 《新运十年》，《革命文献》第68辑，第210页。

② 有关抗战时期“新运”服务团体的详细情况见《新运十年》，《革命文献》第68辑。

总部，并在全国各地设有分社。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全国及加拿大等地共有伤兵之友分社151处，征集社友最多时达80万人。

5. “新运”服务所。主要从事战地服务工作，隶属“新运”总会服务组。1941年8月，第一“新运”服务区办事处成立于昆明，下辖服务所9处。同年10月，第二“新运”服务区办事处在兰州成立，有服务所17处。1943年8月，第三服务区办事处在重庆成立，共辖服务所16处。另外，总会还在云南设有两处边地服务站，负责进行边地“新运”工作。

6. 中国战时服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会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联合发起，1942年12月正式成立，陈文渊、黄仁霖分别担任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委员会设有总务、服务及财务3个部，附属单位包括新兵健康服务队、临时保育院、伤患官兵救护站等，主要从事后勤保障服务工作。

除上面介绍的以外，“新运”总会还组建了非常时期“新运”服务团、学生农村服务团、盟军之友社等，它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为抗战做了一定贡献。此外，1939年8月和1940年秋，“新运”总会还在重庆江北董家溪举办过两届“新运”工作人员干部训练班，培养组织骨干149人。

#### 四、新生活运动对于抗日战争的积极贡献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这段时间，国民党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曾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但在武汉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对日作战逐渐由积极转为消极，并发生了汪精卫集团叛变投敌的重大事件。不过在以后的几年里，尽管蒋介石集团对日秘密交涉从未间断，但终究没有投降日寇，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抗战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在这种复杂背景下进行的，新生活运动对抗战贡献较多的时期，恰恰是在国民党对日抵抗比较积极的时期。



抗日战争八年中,“新运”总会、各级“新运”促进会及其所属各服务团体为抗战所做的工作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为筹集抗战经费发起节约献金运动。抗战爆发前,“新运”总会就曾会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会共同发起过所谓“秋季节约运动”,但内容比较空泛,只是从一般意义上提倡“惜时”、“节用”、“爱物”、“乐业”。<sup>①</sup>抗战开始后,节约运动又成为战时新生活运动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在节约献金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1938年7月和8月,武汉、重庆、广州三市先后成立战时节约运动委员会,《新运导报》也发表大量文章,论述节约与抗战的关系,蒋介石、林森、陈立夫、张群、黄仁霖等都曾就此问题发表谈话。1939年1月,“新运”总会决定设立“推行节约运动会”,统筹推行战时节约运动,各地不再设立节约运动委员会。为此,“新运”总会还颁布《节约运动计划大纲》、《战时节约运动宣传大纲》、《战时节约运动须知》等文件,指出战时节约运动的宗旨是“增加抗战与建国力量,养成国民俭朴风气”。<sup>②</sup>

据有关材料记载,抗战期间由“新运”总会发起或参与指导的献金运动比较大的有这样几次:第一次是1937年8月“新运”总会举办的“输财救国一日一分运动”,历时11个月,收到来自广东、江西、甘肃、湖北、福建、汉口等省市以及美国、秘鲁等地华侨“新运”组织募集的捐款76648.28元。<sup>③</sup>第二次是1938年7月“新运”总会同军委会在武汉共同发起的“七七”周年纪念献金运动,得到了武汉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在为期3天的献金活动中,参加献金者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100万元。<sup>④</sup>

① 钱大钧,《本会过去一年工作的回顾》,《新运导报》第2期,1937年2月发行。

② 见《新运导报》第3期,1938年9月发行。

③ 《本会办理输财救国(一日一分运动)经过并结束该项运动总报告》,《新运导报》第17期,1938年8月发行。

④ 李泽、郑自来,《抗战初期国共合作武汉大事记》,《武汉文史资料》(选辑),1985年第1期。

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6月党员交纳的党费中捐出1000元。毛泽东、秦邦宪、周恩来、吴玉章等分别将当月个人薪水全部捐出。<sup>①</sup>第三次是在1939年2月，当时正值新生活运动五周年纪念，“新运”总会在重庆发起献金竞赛，短短半个月即收到各界捐款200多万元。<sup>②</sup>抗战时期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献金活动是在1942年2月，为进一步推动西南地区战时“新运”，2月19日至24日，“新运”总会在昆明发起节约献金运动，在各界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几天内就募集现金140多万元。<sup>③</sup>以上各次献金运动所收捐献均被转往前线，用于支援抗战或救济难民。

节约献金运动的作用是积极并富有成效的。它不仅有效地支援了前线抗敌的胜利进行，同时激发了各阶层民众的爱国热情，成为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战的重要手段。

其次，提供各种战时服务。随着抗战前线受伤官兵的日益增多，如何使伤员得到及时救治并为之提供相应服务，成为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当时由于战区的不断扩大，交通阻塞，药品、医疗器械和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单靠原有的专职医护人员和红十字会等组织已很难满足战局的需要，“新运”促进会及其所属服务团体开始发挥作用，“新运”医务委员会、伤兵慰问组和伤兵之友社在这方面做了较多工作。

1939年1月，在“新运”医务委员会统一指导下，由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会、上海电灯电话公司等部门和团体资助，先后组建了8支“新运”医疗队，奔波于西南、中南的广大地区，创办了数十个战地医院和诊所，其中第六医疗队还曾随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参加救护工作。据有关方面统计，在1939年春至1942年底的几年里，经“新运”医疗队治愈人数为72879人，敷伤人数是424661人，施行大小手术5420次，矫治骨折839人。<sup>④</sup>

① 见《国共两党关系史》，第430—431页。

②③ 《新运十年》，《革命文献》第68辑，第259页。

④ 《新运十年》，《革命文献》第68辑，第264页。

1940年伤兵之友社成立后，除积极致力于为伤患人员征友外，还着重做了这样几项工作，如为受伤官兵提供特别营养，改善其卫生环境，为伤兵灭虱，沐浴，洗缝衣服，提供卫生用品等。伤兵慰问组则深入各战地医院和诊所，对前线官兵特别是伤残人员进行慰劳、犒赏和抚恤。

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则负责提供专为抗战官兵准备的饮食和住宿，搜集宣传抗战的报刊和书籍供军人阅览，在医院、车站、道边为受伤官兵和过往军人洗衣、供食、代写书信等。苏联和美国空军志愿人员来华参战后，“新运”总会成立空军服务所，后又成立盟军之友社，为来华盟军服务。对于那些辛勤抢运军用物资的运输工人，各地“新运”服务所也尽量为之提供“设备清洁卫生之宿舍浴室”及“富有营养鲜洁适口之饮食”，使他们得以“安适息养”，顺利完成运输任务。<sup>①</sup>

1939年4月，“新运”总会驻武汉办事处还曾设立难胞生活改进团，开办小规模工厂，招收难胞加以训练，一方面使之自力更生，改善生活，一方面支援抗战，以达到“寓生产于救济，以救济为抗战”<sup>②</sup>的目的。

“新运”总会及其所属各团体开展的战时服务，是它对抗战事业的又一贡献，对于激发前线官兵的抗战热情，为抗战提供必要的后方保障，都有积极作用。

再次，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在中国军力、财力均不如日本的情况下，充分调动精神因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显得尤为重要。抗战期间，“新运”总会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抗战宣传工作，早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新运”总会即制定了《发扬民气运动大纲》，组织发扬民气运动宣传队，在城乡广泛开展抗日宣传，使广大民众“确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唤起共同一致的敌忾

① 以上见《新运十年》，《革命文献》第68辑，第293—295页。

② 见《新运导报》第16期，1938年7月发行。

心”。<sup>①</sup>1938年“七七”周年纪念和1939年“八一三”2周年纪念时，“新运”总会都曾组织宣传队，向民众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

1941年2月，蒋介石在重庆发表《新生活运动七周年纪念训词》，他指出，新生活运动实在就是“明耻教战”的运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即在于“造成我们国民能耐苦忍痛、不畏饥寒、不惧强暴、整齐严肃、勤劳俭朴的战时生活，使我们整个民族，能在此生存竞争非常的大时代中，奋斗牺牲，而求得进步与发展，使我们国家能获得永久的独立和自由”。为此他要求人们“再接再厉，自省自强，以完成抗战胜利，达到建国成功”。<sup>②</sup>

“新运”总会还利用播放电影、幻灯，举办各种展览，组织流动宣传等形式，进行抗战宣传。当时，“新运”总会曾组织播放一些以宣传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影片和幻灯片，如《百年约束》、《“九一八”》等，举办了抗敌画展、军事委员会胜利品展览、伤兵之友社工作展览，在群众中较受欢迎。

谈到新生活运动对于抗日战争的贡献，这里还应提及“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妇女新生活运动是战时“新运”的重要方面。

早在1936年2月，就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员会，由宋美龄任指导长，专门从事妇女界新生活运动。抗日战争开始后，妇女“新运”由已往侧重家庭生活改进转变为以支援前方抗战为主要工作内容。在前述1938年5月庐山谈话会上，与会人员根据抗战的实际需要，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妇女统一战线组织，而“新生活运动的组织，作我们妇女抗战建国的总机构，最为适当”。<sup>③</sup>因而这次会议决定“把一切妇女工作放在新生活运动妇

① 黄仁霖：《新生活运动与发扬民气》，《新运导报》第13期，1938年3月发行。

② 见《革命文献》第68辑，第75页。

③ 宋美龄：《抗战建国中妇女之责任》，《新运导报》第16期，1938年7月发行。

女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之下”<sup>①</sup>，共同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谈话会还制定和通过《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大纲》，规定战时妇女应从事的主要工作为宣传、救护、征募、慰劳、救济、儿童保育、战地服务、侦察汉奸等，并确定由“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负责“统一全国妇女工作步骤”，“指示妇女抗战工作的要点”。<sup>②</sup>

1938年7月“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完成改组后，随即投入了保卫武汉的紧张工作。武汉会战期间，宋美龄曾多次率妇女指导委员会成员到城防部队和伤兵医院进行慰问，组织妇女为前线官兵缝制衣服。后来随着战局的日趋严重，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各地及武汉的工厂企业迁往大后方，以保存力量，准备长期抗战，“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协助了这项工作。从1938年6月到1939年6月，经妇女指导委员会疏散的女工及其家属约3000多人<sup>③</sup>，为组织妇女努力生产，支援抗战，做了一项有益的工作。另外，在难童救济、抗战宣传、医疗救护等方面，“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及其所属妇女团体也发挥了妇女界所特有的作用。

从以上介绍的情况看，抗日战争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就其主导方面来说是积极的，进步的，值得肯定的，这与抗战前“新运”有很大的不同。需要指出的是，战时“新运”除积极、进步的一面外，还有消极、反动的一面，这就是本文下面所要探讨的问题。

## 五、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蒋介石当初发起新生活运动，具有对外对内双重目的。在对外方面，蒋介石希望通过新生活运动唤起国民的民族意识，培养尚武精神，以奠定抗战的精神基础。1936年，蒋介石在北平曾对

① 宋美龄，《抗战一年来妇女界的贡献》，《新运导报》第17期，1938年3月发行。

② 详见《新运导报》第17期。

③ 《新运十年》，《革命文献》第88辑，第306页。

蒋梦麟等人表示：“新生活运动要请你们在北方的同志们好好的推动，我有一个深意藏在这新生活运动里边，我想发动全国人民，利用新生活运动发动全国人民，来作抗日运动。”<sup>①</sup>新生活运动中一再强调“知耻明耻”、“救国雪耻”，提倡国民生活军事化，要求养成整洁简朴生活习性，“随时能为国家与民族同仇敌忾，捐躯牺牲，尽忠报国”<sup>②</sup>，都是出于这一考虑。在对内方面，蒋介石选择剿共前线江西南昌作为新生活运动的发源地和试验区，并把“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那套封建伦理道德树为新生活运动的基本行为准则，无非是想通过新生活运动抵制和消除共产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利用封建意识形态禁锢人们的思想和言行，以达到强化专制独裁统治的根本目的。

在抗战爆发前三年多时间里，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服务于蒋介石剿共和消除异己的政治需要一直是新生活运动的基本方面。抗战期间，服务于抗战虽然成为新生活运动的主导方面，但正如本文前面曾提到的那样，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听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因而反共仍旧是战时“新运”的一项内容，蒋介石集团倡导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这个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新生活运动消极面的扩大和延伸。

武汉失守以后，中国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随着持久抗战的到来，蒋介石集团的反动阶级本性也进一步暴露，开始由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积极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就是为适应这一需要而出笼的。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正式确立“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2月20日，蒋介石即在国民参政会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口号。3月11日，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成

① 蒋梦麟，《新生活运动之基本精神》，《新运导报》第121期，1948年2月发行。

② 《新生活运动纲要》，《革命文献》第68辑，第12页。

立，蒋介石亲自担任会长。3月12日，国民党中央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国民公约誓词》；蒋介石于同日发表《为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国同胞书》，对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宗旨、方法和推行步骤作了具体规定，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由此发端。

同新生活运动一样，蒋介石集团推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虽然以抗日相标榜，却很少涉及抗日的內容。关于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关系，“新运”总会与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在两会《工作配合与改进意见纲要》中解释道：“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战时的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平时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新生活运动是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基础，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新生活运动的运用”，“新生活运动旨在恢复民族固有道德，国民精神总动员旨在发扬民族固有精神”，“新生活运动注重合理生活之养成，由外形的调练而达到内心建设，国民精神总动员注重奋发精神之培植，由内心的奋觉而达到于外形的整饬”，“新生活运动要把‘礼义廉耻’表现在‘衣食住行’，国民精神总动员要把‘礼义廉耻’表现在‘管教养卫’。”<sup>①</sup>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曾提到共同目标、同一道德和同一信仰问题。所谓共同目标即人们所熟悉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强调这三条主要是想宣传抽象的国家观和民族观，用民族斗争排斥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战，要求一切抗日武装都“集中”到国民党，无条件服从国民党的指挥。所谓同一道德，则是自新生活运动以来蒋介石集团一直极力推崇的“四维八德”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至于所谓同一信仰，就是要求共产党人放弃自己的理想，信奉三民主义，“建设三民主义的国家”。《纲领》还强调，在抗战中任何人都不能

<sup>①</sup> 《新运十年》，《革命文献》第69辑，第326—327页。

得“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sup>①</sup>这里所谓“自私自利”、“纷歧错杂”，目标所指，世人皆知。

如果说当初新生活运动是作为“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政策产物而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出台，则是为了贯彻实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既定方针，二者在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强化蒋介石集团的专制统治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不仅如此，较之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具有更加强烈的反共色彩。

正因为这两个运动有着上述内在联系，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发动伊始，“新运”总会便同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接洽，双方商定加强相互联系，协调步骤，共同开展工作。关于工作配合方法，两会决定，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由双方负责人及代表共同研究、办理有关宣传、设计、推行事宜，并由两会与其它有关部门组成考核团，定期检查国民生活习惯、道德精神。两会决定，在抗战期间，双方除分别进行各自原有的工作外，应由双方共同承担的工作任务主要有策进战时生活改进，厉行战时节约储蓄献金，协助禁烟禁赌，促进劳动服务，推广体育卫生，促进生产建设，实施员工军事训练，鼓励捐输救国，推广救济难民，加紧慰劳，等等。<sup>②</sup>所有这些严格地讲都可划入新生活运动的职责范围。为使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收到实效，1941年12月，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加强国家总动员实施纲领案》，曾要求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合并工作<sup>③</sup>，但未能实现。

① 《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全文见1939年3月12日《重庆日报》。

② 《新运十年》，《革命文献》第68辑，第330—331页。

③ 详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747页。



以上情况说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不论在指导思想还是工作推行上，都与战时“新运”有着很大差异，它体现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蒋介石集团在抗日问题上的日渐消极，很难称得上是“战时的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从新生活运动那里所继承和发扬的主要是消极、反动的一面，换句话说，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是战前新生活运动的延续。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武汉会战前后，是整个新生活运动史上比较独特的一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果说在此之前新生活运动的反动和消极面占主要地位，基本是应予否定的话，那么对于抗战时期各级各类新生活运动组织和团体为抗战所做的大量有益工作则应予肯定。战时“新运”虽仍有反动和消极的一面，但就其主导方面来说是积极和进步的，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有益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行政学系）